



晚清县令李超琼是苏州老百姓至今怀念的好官。他先后在溧阳、元和、阳湖、江阴、无锡、吴县、南汇、上海等江南八个县，做过九任知县。他顾怜百姓，每临一县，都倾全力兴筑惠民工程，救百姓于水火。他精明强干，想干事，会干事，再怎么艰难困苦都能办成事。他不阿长吏，不欺细民，多次置毁誉于度外，挺身维护老百姓的尊严和权益。他不惜财政亏累，多次领头向上争取，为地方申报蠲免税赋。他洁身自好，处膏不润，为官几十年，不添一亩私产，死后不名一钱，「几无以为殓」。他乐见「西学东渐」，对新思想、新科技充满好奇和崇敬，对势必到来的社会大变革持欢迎态度。本书据实细说这位晚清县令的生平，以及他的性情好恶、人品官德，他的所感与所叹、所思与所虑、所为与所不为。

山长水阔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晚清

县令

李超琼

014039895

晚清
縣令
李趙璜

山长水阔
著

125
1046



原书一页

I-15
1046



北航

C1727147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县令李超琼 / 山长水阔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214-12091-5

I. ①晚… II. ①山…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7805号

书 名 晚清县令李超琼

著 者 山长水阔

责任编辑 许尔兵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印 刷 南京文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20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2091-5

定 价 39.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言 / 001

自序 / 006

家山篇

“葫芦汇” / 011 赤脚童年 / 015 走出大山 / 023
天子脚下 / 033

辽东篇

风雪出关 / 039 军幕生涯 / 046 跨入阌门 / 056

候补篇

需次无期 / 062

溧阳篇

新官上任 / 079 民生为大 / 090

元和篇（上）

紫藤花下 / 096 己丑苦潦 / 100 长堤情深 / 113
水云深处 / 122 书生本色 / 139



阳湖篇

调署阳湖 / 146

元和篇（下）

悲情青阳 / 154 葑门骚乱 / 159 担粪者说 / 165

异物初惊 / 171 咸与维新 / 179

江阴篇

“第一好官” / 187 自强军觞 / 193 戊戌腥风 / 199

过班之旅 / 205

无锡篇

虫口夺粮 / 216

吴县篇

“官不如菜” / 226 太湖之湄 / 232

南汇篇

百年海潮 / 241 耳顺之年 / 248 伤哉贫也 / 253

“李公塘” / 260

上海篇

守令去留 / 265 长夜如磐 / 273 自治督办 / 280

蒲肇夕阳 / 287 生命尽头 / 294 身后无钱 / 299

后记 / 305

序言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国源

纪实文学作品《晚清县令李超琼》的出版，使二十年前苏州东郊娄葑乡金厍村村民关于“一个顾怜老百姓的好官”的议论，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文学形象。

《晚清县令李超琼》的基本素材是李超琼亲属捐赠的一批历史档案。这批档案包括200万字的日记手稿、数百首诗作，以及大量杂著和书信，堆起来高可过膝。对于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官场民情各个方面研究晚清江南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藏。

因为机缘巧合，有幸最先研读这批档案的是个纪实文学作家。一个文学人会从中读到些什么呢？

作者山长水阔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位受老百姓认可的晚清县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书中，作者还显示出强烈的“古今对话”意识。这个意识，又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融入了深切的心灵共鸣和现实思考。

纪实之难，在于忠实地还原生活，把它们重新呈现出来。在作者看来，他所干的活，与博物馆里修复出土陶罐的师傅们的营生很有几分相似。陶罐修复师的工作就是从成堆的碎陶片中捡出有用的，然后拼接、缀合，做出一个与原样尽可能接近的标本。这类

活，其实是非常考验智力和素养的。

《晚清知县李超琼》这个新出炉的“陶罐标本”做得像与不像？品相如何？质地怎样？我感觉它有如下特色：

一、历史感。作者很注重还原人物的历史背景。例如：专制王朝“一人政府”、“一人财政”的地方财政体制特点；选拔官员的考试、纳捐、论选、候补制度；明清江南“一田二主”的土地所有制；晚清“绅权大张”的地方政治特色、江南农村基础设施长年失修的败相、爱国官员为维护主权和民族尊严所作的种种抗争，以及“上海自治”在改革自救中的种种努力。作者阅读了大量历史学著作和地方史志，请教过多位历史学者，还亲自做过若干专题的历史调查。这些背景，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也使作品获得了深沉的历史感。

二、质地感。社会万象在书中人物眼里，都有他自己的“看法”。李超琼出身贫寒，做官仅止于县令，一生贫困相随。在穷苦农家孩子李超琼眼里，官员就是要钱的，衙役就是打人的，复阁重檐的衙门就是魔窟（参见“家山篇”）；在初出茅庐的飘零书生李超琼眼里，从剿匪战场上下来的“人头车”，是要遭报应的（参见“辽东篇”）；身患多种病痛的李超琼初次见识现代医学人体标本和X光透视，又惊异又好奇，但充其量也只敢拿手臂上一个无关紧要的小瘤子去试试洋医生的身手（参见“元和篇（下）”）；对新藩台可能对吴县西山的税赋网开一面抱有指望的李超琼，听说自己送藩台送的生日贺礼只及邻县同僚的一个零头，赶紧自作聪明地再添上“鞭炮一千响”（参见“吴县篇”）；李超琼和陆元鼎都是一时的吴中能吏，陆关心的是为朝廷多收钱粮，而李超琼时时在为百姓的祸福担忧（参见“吴县篇”）；财政困境之中的李超琼，面对一

位衣锦还乡的大学士向地方勒索几百元的车马费补贴，恨不得当面啐上一口（参见“上海篇”）……作者努力地捕捉着笔下人物的“这一个”。无数的“这一个”，综合起来，就是未来陶罐标本的质地。

三、内视感。晚清士人比较注重“内省”，日记和诗歌里常会记录内心的真实流露。从文学作品刻画人物的需要看，内心的波澜与现实事件的曲折起伏一样重要。但是“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般纪实文体如果直接去写人物怎么“想”，往往会引起争议。但是这次，作者有足够的文献资料做依托，可以只管大胆地去深入审视人物的内心。例如，李超琼作为新县令在县城里鸣锣巡街（实际是为铲除赌窝刻意安排的计谋），街上行人的冷漠使官轿中人自感无聊可笑（参见“溧阳篇”）；李超琼内心里对苏州府动用政权机器替田主向佃户逼租的历史秕政的强烈反感和厌恶（参见“元和篇（上）”）；李超琼作令二十年而始终升官无望的酸楚，因缺钱纳捐而忍痛放弃升职的那种痛苦（参见“江阴篇”）；为抵挡法租界的无耻扩张而咬牙举债，发动疏浚蒲肇河的那份义无反顾的决绝等等（参见“上海篇”）。可以看出，在如何处理人物内心独白这个纪实写作的“难题”上，作者穿越“叙”与“想”、“事件”与“独白”的颇具匠心的处理，为传记文学写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四、留出空白。“修复陶罐”，其实最难在于对空白的处理。在这方面，“陶罐修复师”给作者的启示是：对于因为碎片缺失而造成历史叙事的残缺和空白，最聪明的做法是“任由它去”。在纪实作品的文本中，留下一些“残缺”，有时反而倒是一种“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更能取信于人。例如：溧阳农民彭老头从衙门里出来怎样评论自己的县老爷，就是一块空白

(参见“溧阳篇”)；例如：每年秋收都要在玄妙观开张的催租局，不可能因某个县令的反对而撤销，后来怎么样？是一块空白(参见“元和篇(上)”)。例如：在释放革命党人叶仰高的过程中，县令李超琼和总督端方一直是心照不宣，互不说穿的，他们各自的动机也作为空白留着(参见“上海篇”)。再如，李超琼身后的十几万财政亏累后来怎么了结，《申报》的报道和程德全后人提供的资料，都说明这些亏空一部分是通过各县自愿分担解决的，余下部分在社会大变动中不了了之。但是作者认为这对刻画人物已经不重要了，于是，就任由它留着空白(参见“上海篇”)。

小说、戏剧的产品是一个全息虚拟影像，因为作者“无所不知”，所以它们的叙述可以有头有尾，描写可以全枝全叶。而纪实作品是一种像博物馆里的陶罐标本那样可以让读者触摸的真实存在。因为作者“所知有限”，所以它当然只能是留有空白和残缺的；这些空白和残缺，又当然是可能会使一些人掉头而去的。但这只是一时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回过头来，开始饶有兴趣地欣赏纪实作品的空白和残缺，因为空白与残缺反而更容易激发想象和遐思。

纪实作品，贵在真实。作者说：“李超琼是一个至今还留在地方老百姓记忆里的人物。如果没有了真实，就没有了这个人物。”这不仅仅是他“修复陶罐”的一种做法，更是他对纪实写作的基本态度和信念。

山长水阔，实名李巨川，从事纪实文学写作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年有文学评论家就认为：如果要给江苏的年轻作家做一个“点将录”的话，李巨川先生的报告文学和散文是不能忽略的。他的重要纪实作品有《芸芸和她的三男》、《老百姓的小世界》、

《我们与人民共和国同龄》、《裕廊山下那棵海苹果树》、《亲历SIP》等，作品的主人公们在作品发表之前，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寻常人物。这样的选材取向，与这本《晚清县令李超琼》是完全一致的。

作者也是我国纪实文坛上最先尝试“口述实录体”写法的作家之一。一如“口述实录体”对真实的执着坚守、对生活的原汁原味的孜孜追求，《晚清县令李超琼》也是他纪实文学创作的有益尝试。

李超琼晚年曾经在日记里留下过这样一句话：他的这些日记和诗文，“后人见之，亦足知我心矣！”他似乎预感，日后或许会有一个人，在深夜里仔细地品读他的存稿，理解他的宦海人生和心迹。

庆幸的是，这个后来之人，阴差阳错，碰巧是一位兼具文史学养和写作才华的纪实文学作家。李超琼地下有知，应无憾矣！

2014年元旦

自序

1994年秋天，苏州城东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发建设中。我陪同几位德国的电视人寻找合适的拍摄机位，踏上了金鸡湖里西岸的一处“半岛”。金鸡湖那时还是一片乡野土湖。打听之下，才知道我们脚下的并不是什么半岛，而是一段残存的长堤。长堤杂草丛生，伸向湖心。因年代久远，早已断头。附近金厍村的妇女告诉我，这是李公堤。李公是谁呢，妇女们都说不清楚，只道是“古代的一个顾怜老百姓的好官。”“顾怜”是当地土语，有爱护、怜惜、照顾的意思。就这样，我第一次听说了这么个古代好官，还记住了“顾怜”这个含义丰富且有点儿别致的方言词。

1997年，金鸡湖的水面整体纳入城市开发范围。在金鸡湖水产养殖业公司做书记的钱玉芝请我去看一块青石碑。那碑有一人多高，已断成两截。拼到一起，就可见到三个大字——“李公堤”。那字儿隶楷相融，结体方正，端凝内敛，出自大家手笔无疑。我猜想，应当是俞樾。

钱玉芝告诉我，“李公”指的是清末元和县令李超琼。李超琼在光绪己丑水灾的后一年（1890），利用向上争取来的赈款，加上社会集资，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发动上万人力、数千民船，

把咸同年间战争留在苏州城里几十年的废墟搬运到金鸡湖，筑成了一条跨湖长堤。这在当时是个轰轰烈烈、振奋民心的大工程。工程一举多得，大大减轻了湖浪对农田圩岸的冲刷，给湖上行船提供了安全保障，为湖东岸农民进城开辟了一条陆路通道。还有，就是为苏州古城清除了战争伤疤。“李公堤”，是当地老百姓众口相传叫出来的。石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被人砸断。情急之下，水产养殖场的职工们把断碑沉入湖底，让水草和青苔把它遮蔽起来。这样，它才有了今天的重见天日。

县，是两千年君主专制政权的基石。晚清，全国县级政权超过1300多个。这个层次的执政官县令，官阶仅七品。苏州的说书人总爱把他们调侃成芝麻和绿豆。但在现实中，他们却是集地方行政、税收、司法、文教于一身的“百里之侯”，是地方老百姓头顶上的那一方天。

历史的势利和健忘真是吓人。才过去了一百年，李超琼其人其事就难寻记载，只剩“风闻”了。直到2004年，我才读到了从国家图书馆复印来的李超琼年谱抄本和他的几本零散诗集的石印本。

在大清王朝最后的二十几年里，李超琼在江苏南部的溧阳、元和、阳湖、江阴、无锡、吴县、南汇、上海等8个县担任过9任知县，直到63岁走完他的人生。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他是个“县令专业户”。

这个人物，与我头脑中晚清官员昏庸、颟顸、贪婪的形象反差巨大。我因此有感而发，写过一篇小文，粗粗勾勒了这位“顾怜老百姓”的晚清县令的形象。

苏州是个珍视传统的城市，一向注重利用乡土教材倡导廉洁从政。2008年，市纪委编了一本在干部中很受欢迎的《廉石千秋》。

书中收录了陆绩、况钟、陈鹏年、林则徐等苏州历史上的著名廉官的事迹，也收录了我写李超琼的那篇简笔素描。

再后来，2009年，金鸡湖已经开发成为一个既漂亮又时尚的城市湖泊。出于弘扬社会正气的考虑，苏州市纪委和工业园区工委在金鸡湖边已经寸土寸金的新李公堤上，辟出一块几百平方米的黄金地，专门为李超琼树立了大型铜质雕像。那年正好是李超琼逝世一百周年。

这件地方美事被网络传出很远。2010年，苏州市的纪委书记转来一封寄自北京的“人民来信”，由我负责处理。写信人是李超琼的孙辈传人李宙先生。李宙是位退休的中学教师，他从网上看到了苏州人为纪念李超琼所做的一切，表示欣慰，并希望有机会到苏州来祭祖。下一年的清明，李宙和他的六弟李逊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回去后，这兄弟俩又与他们的兄长李林、李钧、李定经过一番商量，共同做出决定，把家里珍藏的祖父李超琼的日记稿本43册、诗文集11册，以及大量的其他相关资料，全部无偿捐赠给苏州工业园区档案馆。

宣统元年（1909）李超琼去世后，他的日记稿本是随灵柩一同被运回四川合江老家的。1965年，定居在北京的李超琼四子李侃先生，即李宙兄弟的父亲，派一个儿子（李焯，现已故）去合江，把它们带回到了北京。李宙和他的兄弟们捐赠出来的正是这套日记稿本。日记内容起自光绪七年（1881）四月初六，迄于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一日。总字数估计超过200万，时间跨度28年。

在这28年里，前5年，李超琼的身份是候补知县（其中，前3年在辽东东边兵备道做幕僚，有候补知县资格，后2年是由吏部分发到江苏的候补知县）；后23年，都是正堂知县。也就是说，他留存

的这200万字日记，记的是在清王朝最后岁月里，江南地区一个最基层的朝廷命官眼里的社会民情和官场人事。

日记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私密文体，其读者，一般只设定为记录者本人。李超琼自己说，“余为日记，皆信笔书之”；“走笔混书，甚形拉杂，繁简均无一处”。从一定意义上说，越是这样“走笔混书”的日记，历史价值就越高。

这些日记，将来对研究晚清江南政治经济的历史学家必有大用。而我受档案中心委托，成了第一个全面研读它们的人。我的关注点与历史学家不同，更感兴趣的是这位受老百姓认可的晚清县令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性情好恶、人品官德，他的所感与所叹、他的所思与所虑、他的所为与所不为，他在国力羸弱、官场昏暗、社会矛盾尖锐对立情况下，居官为政的种种抉择，所展示出来的人生底色。

事实上，早在捐出日记原始稿本之前一年，李宙就在帮我“先睹为快”了。他用数码相机把日记一页一页地拍摄下来，再通过网络打包发送给我。我粗略读完一遍，足足花了一年的业余时间。网上传来的邮件打印到纸上，大多成了黑乎乎的一片，读起来很累。常常要为某一个字辨认半天，弄得眼睛发酸发痛，难以为继。但是，每天深夜，倘佯在刚健俊秀的古人墨迹之间，细细品味这位一百年前的“县委书记”的心路历程，实在是一种久违的精神享受。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那时的官场人事与今天的现实多少有几分相似。每每掩卷沉思，都会感觉像是经受了一场痛快淋漓的心灵洗涤。

日记具有其他文体无可企及的心灵穿透力。透过“平常日子平常事”的点点滴滴，能够清晰地看到写日记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脉

动。李超琼有过这样一句话：他的这些日记，“后人见之，亦足知我心矣！”他似乎预感，日后或许会有一个人，在深夜里仔细地品读他的日记。

这个后来之人，阴差阳错，碰巧就是我了。

帮助我深入了解这个人物的，还有他留下的好几百首诗歌。他的诗曾受到过俞樾的赞赏。除了抒情、明志之外，还许多首情节完整，细节精彩，形象丰满的叙事诗。李超琼写诗与写日记一样勤快一样真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写的诗也只是自唱自叹，不肯轻易示人的。

在大量的第一手资料面前，我开始为自己曾经在纪委的廉政教材上写过的那个脸谱化、标签化的“廉官人物”坐立不安起来。于是决定重起炉灶，尽我所能，写出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李超琼。经过一年多努力，完成了这本人物传。

我努力把这本讲述一百多年前的人和事的书写得明白、生动、好看。但我相信，最后能打动读者的，只是书的主人公——一个真实存在过的人的本身。他是一个至今还留在地方老百姓记忆里的人物，没有了真实，就没有了这个人物。

本人学浅笔拙。写这个人物，涉及的历史知识太广太深，难免出错，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葫芦汇”

李超琼，字紫璈。道光二十六年（1847）十一月二十日，生于四川直隶州合江县东乡中汇支大字湾。

合江，置县两千余年，有地两万余“方里”。^[1] 县域位于四川盆地南部边缘，今川、渝、黔三省（市）结合部。境内大小诸山大多为来自云贵高原的大娄山余脉。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平均海拔一千米。西北、东北分别与泸县、江津县接壤；西南临赤水，东南濒习水。

金沙江和岷江从青藏高原泻落，浩浩荡荡，在宜宾汇入长江。长江在川渝境内江段称川江。川江经合江县域腹地穿行而过，陡坡挨着陡坡，拐口接着拐口，曲曲弯弯，犹如一条巨大的环带。江上险滩密布、暗礁林立。滔滔江水状如怒马，声如雷鼓，日夜奔腾，势不可挡。

川江过了泸州，便与赤水、习水交汇。三条江的交汇形成一个葫芦形的三角地带，属合江县东乡中汇支，俗称“葫芦汇”。

这个葫芦汇，是由川入黔的关隘，史上称“符关”。符关，周时属巴国，秦时隶巴郡。蜀汉中郎将唐蒙从巴蜀入夜郎，便由此过。蜀汉在这里设置了长江上游最早的县级行政机构——符县。但县名屡改，直至后周，才定名为“合江”。

合江县的衙门历来都设在葫芦汇里，明代在合江县衙所在的葫芦汇里建造土城，逐渐形成了城厢。清乾隆二十六年城墙大修。新城墙延长至四百六十四丈，加高至一丈五尺，东西南北各设城门，城内有街九条、巷三条，街道平整，市面尚称繁华。

站在城里，向西门外不远的松盖山看去，可以看到山腰间绿树环绕，一座农舍缘壁而筑，这就是被李超琼称为“半山半城之庐”的祖屋。

合江县地处四川盆地南部，霜冻期短，终年雨水充足。春天来得早，夏天比较热，秋天凉爽，冬季温暖。全境都在原始森林覆盖之中，据说是地球上同纬度低海拔地区保存最完好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之一。合江县荔枝和青果产量占全川的九成以上，向来就有“荔枝之乡”和“青果之乡”的别称。合江又是长寿之乡，光绪年间，全县人口“耆耆为多，而寿妇则有逾百龄者”。

县域多山，重峦叠翠，群峰相连。东有龙虎山、神臂山、凤凰山、圣殿山、立灵山；南有进宝山、石龟山、雨台山、玉泉山；西有三星山、月台山、应灵山；北有同连山、少东山、聚宝山、香炉山。留在旧县志上的山名大都透着灵仙之气。

奔腾的大江、丰饶的森林和灵秀的山峦，使合江令人无限神往。

合江县山多田少，地半贫瘠，民人多以农为业。她的历史与四川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人口灭绝和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有关。

十四世纪中叶的元末明初，由于战乱，人口锐减。明朝初年推行“楚民实川”政策，遣大批湖北农民溯江而上，徙籍入蜀。最后在“葫芦汇”里落户定居下来的，主要是来自湖北孝感乡八斗坵的移民。其中就有李超琼的祖先。

明末清初，因战乱和灾荒，合江人口再度锐减，全县仅剩户籍一百二十，丁口剩不过千。巨创之后，县域内百里为墟，满目凄凉。李超琼的祖先为躲避杀戮，随着逃难的人群，颠沛流离，躲